

钱钟书与《毛泽东选集》《毛泽东诗词》 英译工作

白小麦

钱钟书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《毛泽东选集》(简称《毛选》)第一卷至第三卷英译稿的工作,60年代初参加第四卷英译和前三卷重新修订工作。1960年参加《毛泽东诗词》(简称《毛诗》)英译审定工作。他是唯一参加过《毛选》四卷和《毛诗》英译工作的作家、学者。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前后花费多年时间,可以说,是钱先生人生及其学术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英译《毛选》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重要而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和翻译工作,限于当时严格的保密制度,内情鲜为人知,至今有种种说法,尚无全貌和定论。钱先生平日健谈无饰,对此事却三缄其口。他终其一生躬耕于学术,从事文字工作,曾感慨,编写大部头的书,写论文,作注释,翻译,最难的是翻译,一

个字都逃不过去。这恐怕更多包含了他参加《毛选》《毛诗》英译的甘苦感念。按钱先生自己的说法，“译《毛选》个人无法完成，而集体翻译难度，实际增大许多。一切新鲜译法，要经过重重辩驳，需要从少数一步步走到多数。”他曾对杨绛说：“这件事不是好做的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”

《毛选》英译工作，大体分为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两个阶段。前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翻译第一卷至第三卷（因第二卷篇幅长，分为两卷，故有四卷之说易混淆），后一阶段由中共中央联络部组织翻译第四卷、重新修订前三卷。

1950年5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《毛泽东选集》出版委员会，成员有胡乔木、陈伯达、田家英等。同月，中宣部成立《毛泽东选集》英译委员会，徐永煊任主任，邹斯履为秘书。全部成员都通过严格政审，是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翻译家、学者。委员陆续参加进来，逐渐增加，据多位当事人回忆，有钱钟书、金岳霖、王佐良、郑儒箴、陈振汉、陈逵、胡毅、赵一鹤、杨庆堃、王仲英、熊德威、袁可嘉、黄雨石、沈国芬、方矩成、罗良、周家駭、于宝榘、杨承芳等；还有唐明照、浦寿昌、章汉夫、冀朝鼎等党内外事干部，前者多承担翻译，后者在工作之余参加审稿。全体人员集中在北京西单堂子胡同的一个大院子里工作。

钱先生1955年填写《中国作家协会



20世纪50年代中期钱钟书（左）与李健吾在北大中关村

会员表》记：“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（1954年）2月皆全部从事《毛泽东选集》英译工作，故无暇顾及其他活动。”

1950年7月，时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，到清华大学面访钱先生。8月，钱先生被借调到毛选英译委员会，同时选进的还有金岳霖和王佐良。钱先生住在堂子胡同，每星期搭公交车回一趟家，指导研究生学习直到他们毕业。这里住宿条件比较差，委员们按年龄大小等个人条件安排宿舍，钱先生刚届不惑之年，可能算比较年轻的，被分在阴暗潮湿的平房住下。

翻译工作主要采取“译场”式集体翻译。一般经过初译，相互校勘，集体讨论后定稿。对译文字斟句酌，主要采取直译，经过多次集体讨论最终定稿。

過去有什麼	註：關於新舊著作，請填具出版發表的年月與處所
主要著作？	"寫在人生邊上"(1940), "文叢鬼"(1946), "談藝錄"(1948)——以上"開明書店"出 "圍城"(1947)——"晨光園書公司"出版。
近三年來有	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2月皆從事 ^{全部} "毛澤東選集"英譯工作(現在尚部 從事此項工作),故無暇及其他活動。
何新作？	

1955年钱钟书写写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表手迹(部分)

工作艰苦但进展很顺利，到1951年4月翻译、校勘任务完成。但存在不少问题，讨论拿不出统一方案，委员水平参差不齐，翻译风格不同，给统稿校勘工作留下不少困难。1951年7月结束工作。这个时期，曾聘请一位英国顾问史平浩，虽只有半年时间，但他对钱先生评价是“非常有才华”，对他非常佩服。

定稿中对原文提出的疑难问题，由邹斯履请示田家英，当面听他说明解答回来再作传达。必要时由田家英提交毛主席决定是否采择。比如讨论《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》时，钱先生说文中“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”不对，是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。有人调取各种版本的《西游记》查看，证实钱先生没错。请示毛主席同意改正，避免了一处缺失。又如60年代初修订前三卷时，“本本主义”的译法是造新词 Bookism，还是常用的 Book Borship，毛主席选用后者。

1951年7月，毛选英译委员会改名为毛选英译室，徐永煊仍为主任，钱先生留下了。任务是按照新的《毛选》中文版校勘译文。通过将近一年共同工作

的亲身了解，徐永煊对钱先生的学问和为人有了更多的认识。钱先生作为英译室唯一的委员，参与了《毛选》英译稿的最后修订。1952年11月，第二卷全部译校完毕，报送胡乔木审阅，获得好评。1953年11月，第三、四卷译本（因第二卷较长，前三卷译稿分为四卷）最后定稿，英译工作完成了。年底，中宣部毛选英译室撤销。钱先生是《毛选》前三卷英译本的最后审定者之一。

《毛选》前三卷的篇幅及出版：第一卷（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）17篇、第二卷（抗日战争前期即1937年7月至1941年5月间）40篇、第三卷（抗日战争后期即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）31篇，分别于1951年10月、1952年4月、1953年4月出版。中文版编辑出版工作与各卷英译工作同时展开并同步完成。其间虽然毛选英译委员会可以提前几个月得到中文稿，但原文反复修改的情况时有发生，给英文翻译带来一定困难，需要反复作出相应的修改。杨绛曾形象地谈及：“希腊荷马史诗中的奥第修

斯在外流浪十年，他的老婆是很美的人。人家追求她，她就以给公公织衣服来拖延。早上织，晚上拆。翻译《毛选》，就好像是织衣服。”

当时，毛泽东的文章不少以前已经翻译成英文。参加英译工作后，钱先生翻译了《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》《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》《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》等篇，主校、副校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《〈共产党人〉发刊词》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》《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倾向问题》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与任务》《红色边区的经济建设》等篇。金岳霖负责翻译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等。在毛选英译委员会里，钱先生是唯一的文学家。故一般人推理，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是他翻译的，以讹传讹，似成“定论”。其实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早有英文译稿。

《毛选》前三卷英译稿，做到了信、达，几近乎“雅”，获得授权的英国出版者极高评价。当伦敦出版者拿到第一卷译稿后，对中国的翻译工作给予充分肯定：“译者完全能驾驭英吉利语文和风格”；第二、三卷陆续寄到伦敦后，几乎未做什么改动就付梓印行了。

《毛选》前三卷译稿完成后交英国共产党中央，1954年初由英共的英国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出版，同期在美国纽约由国际出版公司出版。这个英译版称为“初版稿”。

这时横生枝节。出版当年，英共一位作家对“初版稿”不尽满意，主持并主动邀请钱钟书、徐永焯参与修改，至1960年前后完成。此稿称为“旧改稿”，未正式出版。60年代初，中联部再次组织《毛选》前三卷英译本修订时，将其作为修改基础之一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当年《毛选》翻译后我们自己没有出版？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印刷水平相当落后，没有把握印刷发行。《毛选》英文版的版权谈判由北京外文出版社负责。1953年1月，外文出版社起草《对于〈毛泽东选集〉英译本出版的意见》，报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审批。其主要内容之三是，国内不出版《毛选》英译本，只出版单行本，如需英译本选集，由伦敦方面供应。刘少奇批示同意。5月，英国汤姆斯·罗素代表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来华，与我方签订在英国出版《毛选》英文版协议。1961年，中英合同期满，始由外文出版社出版《毛选》英译本。

还有一个插曲。伦敦英文版出版前1954年3月，英共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写信，提出删去《毛选》第二卷《战争和战略问题》一文中的两节（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），因英共反对武装斗争方式（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“走向社会主义之路”的纲领，英国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）。对波立特的建议，中宣部起草复信稿表示同意，毛主席即写信给陆定一严厉批评：“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

了错误——同意英的错误提议——应当注意。”随后中联部代中央起草复波立特函，经毛主席审阅后发出，明确表示不同意删去该文这两节内容，主要是“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，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，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变化，而需要作什么修正。而且《毛泽东选集》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，都没有作什么修改。”

因此，英国伦敦初版和美国纽约版与中文版有一个区别：都删去了《战争和战略问题》第一部分《中国的特点和革命》第一、二段的内容。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1954年在英国出版《毛选》前三卷还有一个版本，是参照俄文版内容格式，发行对象主要是各国共产党、左派团体等。至1954年，毛泽东著作行销50多个国家。

进入60年代，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。中央认为50年代翻译的《毛选》前三卷存在右的思想，决定由中联部组织《毛选》第四卷翻译工作，并对《毛选》前三卷英译本进行审订修改。

1960年二三月，《毛选》第四卷中文版审定工作在广州完成。5月，中联部《毛泽东选集》翻译室成立，部长伍修权挂帅。春夏之间，徐永煥大病初愈，再次受命主持《毛选》第四卷英译工作，至秋完成初稿。

英译初稿组有：程镇球、郑儒箴、杨承芳、陈龙、吴景荣、方钜成、于宝渠、赵一鹤等；润色组有：钱钟书、外国专家马尼娅、柯弗兰等。办公地点在

万寿路十八所。不到半年时间完成初定稿。

9月30日《毛选》第四卷出版。11月，中央外事小组和中联部报送周恩来并党中央《关于翻译和出版〈毛泽东选集〉外文版的报告》。中央指派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组织审定第四卷英译稿，章委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主持。

参加定稿的有：孟用潜、徐永煥、冀朝鼎、唐明照、裘克安、程镇球（孟用潜助手），美英友人柯弗兰、爱德乐、爱泼斯坦和李敦白。办公地点在东交民巷十五号宾馆（王府井大街前使馆区的法国大使馆）。工作时间为每天下午2时至晚10时，中间休息一次，7时晚餐后继续讨论，可谓相当紧张。出版前，还征求了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、乔冠华、浦寿昌等人的意见。1961年春，《毛选》第四卷译文定稿，5月1日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毛选》第四卷英译工作开始不久，1961年初到1962年初，开始参照伦敦版对《毛选》前三卷“旧改稿”全面重新修订，徐永煥因病退出，由孟用潜主持。翻译组和定稿组人员有所变动。参加定稿的有：孟用潜、钱钟书、程镇球、冀朝鼎、唐明照、裘克安、吴文焘，以及外国专家柯弗兰、爱德乐、爱泼斯坦、李敦白、夏庇诺（新华社英文专家）等，徐永煥因病参加了几次讨论，亦征求了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、乔冠华、宦乡、浦寿昌等人意见。翻译组还有北京外国语学院和涉外单位的一些年轻人参加译

文讨论，并充当助手。定稿讨论认真仔细，逐字逐句推敲，有时整个下午才完成一页左右。中方定稿人主要判断译文是否忠实，充分表达原文意思和精神风格。外籍审稿人着重译文是否通顺、地道，通过译文推断原文意思，提出修改意见。讨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，但大家毫不在意，反复交锋，通力合作。爱德华称之为“针锋相对的翻译方法”。

修订初期，极富经验的徐永煊致信孟用潜并伍修权，认为伍修权和孟用潜提出的“英译旧改稿的再次修改，应该在保持已有的成就的基础上进行”，“是简明而正确的方针，应当予以贯彻”。根据这一方针，定稿的标准注意三点“才可以彻底体现在旧稿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精神”。为提高工作效率，加强集中，他“建议由程镇球、SOL（即爱德华——笔者注）、钱钟书三人，组成咨询小组”。徐介绍说，钱钟书“政治觉悟差一些，而汉文英文却都很好，特别是始终地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”。“如果把这三个人摆到一起，担任全面、细致的衡量性的工作，则能收政治和技术、英文和汉文、旧人和新人的结合的效果”。“咨询小组由钱程二人分担不同文章的主审二审，交换看稿，协商定夺，再交SOL。SOL进行必要修改，三人就不同意见协商，记下异议，流水上交用潜同志审阅。……”

经过长达4年时间的全面修订，1964年9月第一卷出版，1965年9月第三卷出版，同年12月第二卷出版。至

此，《毛选》外文出版社版第一卷至第四卷出齐。十多年后1977年，《毛选》第五卷出版，《毛选》英译工作全部完成。

二

人们很少知道，1960年钱先生还参加了《毛泽东诗词》英译本定稿工作。

叶君健会五六种语言，曾是《中国文学》英法文版负责人，是英译《毛诗》的推动者和参加者之一，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较为详实的回忆，似因这方面资料较少，其文章几乎成为了解《毛诗》翻译的权威之作。这里，笔者主要按叶君健的说法并综合其他有关资料，简略说一下。

1957年1月，臧克家主编的《诗刊》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诗词《长沙》等18首。《中国文学》争得外文出版社英文组负责人于宝桀协助，1958年完成18首英文翻译，并在《中国文学》（英文版）第3期上发表；同年9月，外文出版社出版单行本，增加了1958年《诗刊》又发表的一首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，共收入19首诗词；10月3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送瘟神》二首，《中国文学》译成英文，与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一并在《中国文学》（英文版）1960年元月号发表。

随后，叶君健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，请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主管毛泽东诗词翻译定稿工作，商得袁同意和上级批准，即成立中宣部《毛泽东诗

词》英译定稿小组。袁水拍任组长，乔冠华、钱钟书、叶君健（兼做事务性的组织和联系工作）为组员，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泽东诗词，出版单行本。袁水拍对原作的解释有最后发言权，乔冠华的解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钱钟书和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润色工作。

1962年，《人民文学》5月号发表毛泽东诗词《蒋桂战争》等6首，小组随即完成英译定稿。

1963年12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《毛诗》单行本（共收入37首诗词，包括未曾发表的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等10首）。为全面修订旧译、翻译新的10首，小组增加赵朴初，并请英文专家爱德乐协助润色译文。1965年夏，10首新诗词翻译初步完成，9月19日致函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征求意见。袁水拍通过中宣部，将新译文和旧译文一并发给几个主要省市的宣传部，并转一些大学的英语教授征求意见。小组根据征集的意见，对10首新诗词译文最后定稿，1966年《中国文学》5月号发表。后续工作，因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而中断。

1974年秋，重新开始进行毛泽东诗词全部译文定稿工作。不久，袁水拍、钱钟书、叶君健与爱德乐初步完成译文定稿。1975年初，袁水拍与叶君健去上海、南京、长沙、广州等地，向一些大学外语系师生和有关人士（如毛主席老友周世钊）征求意见，在大学还

召开了讨论会。回京后，小组根据各地意见，对译文作最后加工。乔冠华因忙于外事，推荐外交部周珏良代为参加讨论。经过反复推敲，译文终于定稿。袁水拍遂报送上级审定。1976年五一节，《毛诗》英译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。这个英译本，实际成为外文出版社后来出版法、德、日、意、西和世界语等译本的蓝本。

毛泽东诗词虽是文学作品，但政治含意很深，译者不时感到困惑。特别是作者认为“诗无达诂”，文学作品应由读者自己体会，不需别人划框框。翻译和定稿，既要正确理解原作字句的意义，又要正确阐释其中的政治内涵。当解释不一致时，总是以袁水拍和乔冠华的看法为准。但他们的理解不免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。还有为诗文作注释，在定稿中也成了极为复杂、细致和敏感的问题。乔冠华最后建议，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释外，小组所作注解一律撤销。

小组成员对每一个词、每一个句子进行反复讨论和斟酌。爱德乐不谙中文，作为英译诗词的第一读者，对译文“诗”的效果特别敏感，他从英语“诗”的角度提出意见，常成为讨论的中心。小组的要求是：译文既要“信”（包括字义、意境和政治的“信”），又要“雅”即具有相当高水平的“诗”。叶君健认为，有赵朴初那样著名诗人和钱钟书那样有修养的诗评家，最后译文的“风格”基本上能达到一致认可的程度。

三

钱先生的英文水平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闻名于清华大学。当时，英国著名汉学家、翻译家李高洁选译《苏东坡选集》，请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钱先生作序。钱先生清华大学毕业，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考取英国牛津大学，在爱克赛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。留学期间，牛津大学出版一套“东方哲学、宗教、艺术丛书”，他被聘请担任特约编辑，是编辑组唯一的中国学生。70年代末，钱先生代表作之一《管锥编》出版，书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，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班牙等数种语言的著作1780种，所引用的外文很多是凭记忆默写的，绝非一日之功。

程镇球（曾任中央编译局《毛泽东选集》英语翻译组组长）回忆：“钱钟书五十年代初即参加过《毛选》前三卷的英译定稿工作，亦曾为《毛选》第四卷英译进行过润色。徐永燝一直对他很倚重。”

1952年秋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，由于翻译人手不足，会议翻译处处长徐永燝主办应急培训班，还借调钱钟书、许国璋、吴兴华、巫宁坤等学者协助培训。

徐永燝生于1902年，年长钱先生8岁；1916年考入清华大学，1924年毕业于，早于钱先生9年，为学长。徐永燝1927年加入中共，是清华学生中第一批党员。他与钱先生在《毛选》英译工作中，

切磋琢磨，相互“较真”，结下深厚友谊，成为莫逆之交。徐永燝长子徐庆东《父亲琐记》有记：“有一次，钱叔叔来家里和父亲聊了一天，天色已晚，起身回家。我跟父亲母亲送他。出门的过程中，两人谈话始终不停。那天下着大雪，他们站在雪地里聊，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母亲看快到吃饭的时间，就跑回家拿了颗白菜给钱叔叔（困难时期，大白菜是细菜），他把白菜往腋下一夹，就走了。一小时后，杨绛阿姨打来电话，问母亲是不是给了钱钟书一颗白菜。原来，钱叔叔回家后，杨绛阿姨发现他夹着白菜，问是哪儿来的，回答说不知道。”杨绛说，钱钟书“在徐永燝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，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”。

1999年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、党组书记李铁映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赞扬钱钟书：“自五十年代以来，钱钟书出色完成了党和国家委托的工作。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《毛泽东选集》英译委员会”，“1960年他又参加了《毛泽东诗词》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，断断续续直到‘文革’开始受冲击‘靠边站’，工作才停顿下来。到1972年，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，终于使《毛泽东诗词》英译本得以出版。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，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，但他从不以此为耀，宣示他人”。（责任编辑 黄艳）

作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人员